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中国漫记

〔罗〕尼·斯·米列斯库 著 蒋本良 柳风运 译

K928.9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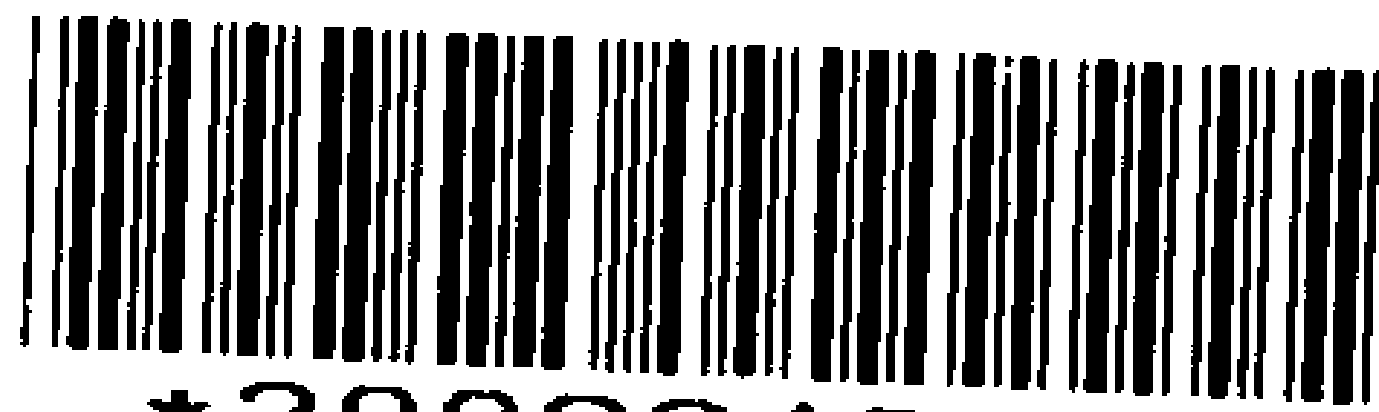
86998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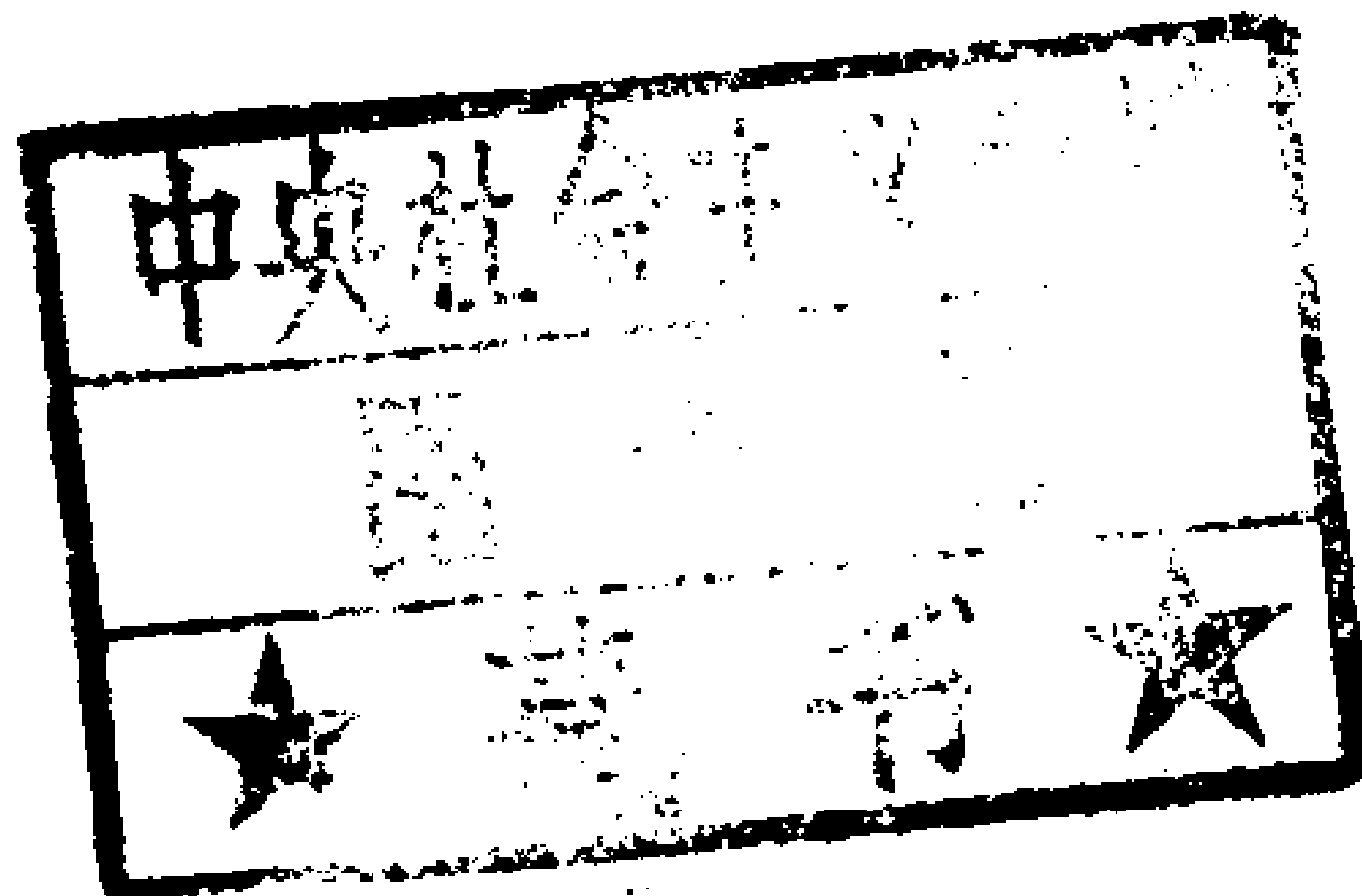
# 中国漫记

〔罗马尼亚〕 尼·斯·米列斯库 著

蒋本良 柳风运 译



\*200324988\*



中华书局

1989年·北京

**DESCRIEREA CHINEI**

**N. SPATARU MILESCU**

Bun de tipar 18.11.1975

editura Minerva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中国漫记**

[罗]尼·斯·米列斯库 著

蒋本良 柳风运 译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8 1/4 印张·140 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 册 定价: 3.90 元

**ISBN 7—101—00505—5/K·221**

01321-505

## 译者的话

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 Spataru Milescu)所著《中国漫记》被誉为十七世纪中介绍中国较详细的一部作品。由于作者对当时中国实情考察之细致,蒐集材料之丰富,文笔之生动而被称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一幅才华卓绝的壁画”(本书序,页11)。

作者米列斯库(1636—1708)生于罗马尼亚莫尔多瓦地区,启蒙于雅西城,后转君士坦丁堡就学,攻读希腊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神学、哲学、历史以及文学等课程,接着又到意大利学习拉丁语、意大利语、自然科学和数学等。学成归国后,在当时罗马尼亚的两个公国历任宫廷文书、兵部总管、常驻奥斯曼帝国使节,先后出使过瑞典、法国等国。1668年因篡夺王位之嫌而受劓刑,随后出走君士坦丁堡。1671年,在过去学友、当时的耶路撒冷大主教之推荐下,去俄国任外务署的希腊文、拉丁文和罗马尼亚文翻译,不久被提升为首席翻译。1675年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1676年在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1678年返回莫斯科,1708年于该地去世。

作者从当时对中国充满神奇传说、迷惑不解而又十分向往的欧洲,抱着探索中国之真情的热切愿望,步入了清朝鼎盛时期的中华帝国,以好奇赞叹的眼光,饱赏中国之古老文明,由衷感受中国大众之勤劳朴实和聪敏睿智。《中国漫记》涉猎

甚广，既有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也有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奇闻轶事和神话传说。作者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善良，说中国人勤奋无比，永无止境；视务农为立身之本，变荒漠为沃土，阡陌纵横，井然有序，无它国可与媲美；中国之于世界，犹如掌上明珠、指环上镶嵌的宝石；中国人以和善为贵，视格斗与战事为禽兽之行；待人处世礼仪之重，居世界之首；长者无处不受敬重，远方客人宾至如归。作者对当时中国工艺技术之发达，甚为惊讶，说中国铸造大炮、制作火药、印刷书籍、罗盘航海，均领先于欧洲；中国桥梁建筑牢固耐用，举世无双；作者把“火井”（采烧天然气）、“燃烧如木之黑石头”（煤炭）当作欧洲见所未见之奇闻；此外，对号脉诊病、草药功效，刺绣鸟兽栩栩如生，行船摇橹既能推进又兼掌舵，驯养鱼鹰捕鱼，用一种“铁手”挖土取水等等，无不感到十分新奇而备加赞赏。作者对中国崇尚学问，尤为仰慕，说中国官职升迁均以学识深浅为准，甚至说中国无人不知书识字。书中还夹以传说故事，更添趣味。此外，作者对清朝官场之种种弊端，也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严厉的鞭笞，斥之“虚伪、谰诡”。还有商人“竭尽敲榨勒索之能事”，对一般不良习俗，作者也加以谴责，说“如此智慧之民族，竟捏造出妇女裹足之劣端来，令人惊诧！”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了中国人的一些缺点和不足，如说中国人散漫无秩序，打起仗来“勇如妇孺，怯如走兔”，中国科学不发达；有时对官宦商贾一概斥骂，不加限制等等。总的来说，本书对我们从另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状况，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原稿已失传。据考，原稿用古斯拉夫文写成。现存

二十六种手抄本,有的是斯拉夫文的,有的是希腊文的,分别藏于列宁格勒、喀山、巴黎等地图书馆。喀山大学瓦西里耶夫教授珍藏的教会斯拉夫文手抄本,1910年在喀山印刷出版的《中国漫记》即以此版本为依据,并附罗马尼亚历史学家伯尔布勒斯库作的序。此《序》批驳了英国人约·弗·巴德利所说《中国漫记》一书相当部分是从卫匡国的《中国新舆图》文字说明中剽窃来的论点,说明了《中国漫记》取材来源的多样化,既有米列斯库亲身考察所获,也有各种书籍、官方文件和民间传说等。此《序》现一并译出。

尼·斯·米列斯库出使中国的另外两部著作为《旅华日志》(或称《旅经西伯利亚日志》)、《出使中国奏疏》(或称《官方文件》、《出使报告》)。商务印书馆曾于1981年出版了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的中译本,该书下卷第二册曾大量引用了《旅华日志》和《出使中国奏疏》,可供参考。该书将作者的名字译为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即本书作者尼·斯·米列斯库。

本书根据1975年罗马尼亚文版翻译。注释为原罗文本所有,我们所加的注用译者注标出,以资区别。本书一些人名地名的翻译,我们曾参阅了《大清一统志》、《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书,但由于原文几经转译和语音上的变异,可能仍有错误和欠妥的地方,敬希读者指正。

1985年12月

## 序

斯帕塔鲁·米列斯库赴北京途中刚抵达脑温（今齐齐哈尔——译者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猝亡<sup>①</sup>，引起俄国统治阶层的一系列更迭，也给米列斯库的回程增添了不少意外，使他备受艰辛与周折。

不过，米列斯库是在1676年11月在回国途中到达色楞格斯克后，才得知莫斯科发生突变消息的。也许由于隆冬降临，这位使节有意在此多作耽搁，一方面静观莫斯科政局的演变，同时乘机撰写他的出使报告，以向新沙皇的僚属述职。也可能由于道路堵塞，米列斯库直到1677年6月7日在叶尼塞斯克才获悉阿列克谢沙皇去世和马特维耶夫被贬<sup>②</sup>。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富于政治阅历的使节立即意识到，他在外务署<sup>③</sup>的地位是削弱了，需经一番新的搏斗始能复原。

米列斯库于1677年7月9日离开叶尼塞斯克，7月20日开始回国旅程的第二阶段，即由水路从马科夫斯克寨到托博尔斯克<sup>④</sup>。

莫斯科的某些新贵们想打击阿列克谢沙皇前宠臣手下的

---

① 1676年1月29日。

② 参阅《旅华日志》1958年E、S、P、L、A、（国家文艺出版社）第二版，第319页。此论据可参看《旅华日志》前言，也可参阅“大众图书”版第156期，1962年。

③ 当时莫斯科主管对外关系的机构。

④ 参阅《旅华日志》，第319页。

佼佼者——米列斯库，根据这些人的训谕，叶尼塞斯克的总督，在米列斯库走后，对他在中国时的表现作了追查，以在米列斯库抵达莫斯科之前，就把他出使的情况先期报告外务署长官。提供情况者，自然也有米洛瓦诺夫<sup>①</sup>。或出于忌妒，或出于投机，他<sup>②</sup>于1677年8月9日书面控告米列斯库作为首席使节<sup>③</sup>滥用职权，无视礼节，践踏训谕。

这些情况，米列斯库直至9月25日抵达托博尔斯克后才得悉。米列斯库在托博尔斯克被扣留到12月1日，才被获准回返莫斯科，并于1678年1月5日抵达这里<sup>④</sup>。

但米洛瓦诺夫的控告无损大局，因米列斯库仍获准返回了莫斯科，在托博尔斯克也没有象尤里·克里让尼奇<sup>⑤</sup>所遭遇的那样被软禁。尽管如此，一旦抵达，按出使规定，米列斯库即去呈递《官方文件》<sup>⑥</sup>（大概是《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边

① 一个崭露头角的哥萨克人，涅尔琴斯克总督阿尔申斯基曾派他出使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后于1676年，因通晓去中国的道路，也参加了米列斯库率领的使团（参阅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伦敦，第二卷，第九章，第195页）。

② 参阅《旅华日志》第19页。

③ 参阅巴德利：前引书目，第二卷第442页。

④ 米列斯库出使中国往返时，在莫斯科到马科夫斯克这段路程，用的是同样交通工具，走的也是同一条路线，而且均为夏天。对照来去旅程所花的时间，并根据《旅华日志》记载的材料，即可推算出这里所列举的时间表。1675年，米列斯库从莫斯科到托博尔斯克走了二十七天，从托博尔斯克到马科夫斯克走了六十五天。回来时，从马科夫斯克到莫斯科走了一百六十六天。减掉去中国时在这两点之间旅程实际花的大约九十八天，剩下的六十天就是在头一个大城市托博尔斯克被当局扣留的时间。

⑤ 参阅《旅华日志》第33页。

⑥ 《官方文件》是所有俄国使节自越过国界之时起，必须写的逐日报告，内容是完成使命和谈话情况。1906年由尤里·阿尔谢尼耶夫发表于彼得堡。



界西伯利亚纪行》<sup>①</sup>)时,外务署新的官员迎接他的是怀疑和审慎。

虽然米列斯库还在托博尔斯克等候沙皇钦准回返首都时,已拟就《中国漫记》初稿,因为书尾具明日期为1786年<sup>②</sup>11月13日,但可以推测,米列斯库并未立即交出书稿。我们认为,米列斯库不堪世态之炎凉,力图冲破自他返回莫斯科之后旧友冷漠的氛围,他又对此书精雕细刻,扩充了篇幅。《漫记》所举某些日期也可证实我们这个推测。对这些日期,以后我们还要讨论。显然,在托博尔斯克等候莫斯科外务署的训令期间,米列斯库曾与这里的旧友攀今道故,聚首往事。这里的朋友比叶尼塞斯克的朋友<sup>③</sup>更为真诚,对米列斯库十分同情,可能也给他补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况。当时托博尔斯克是西伯利亚最重要的商业城镇<sup>④</sup>,每年都有许多中国商人、鞑靼商人和布哈拉商人到这里来赶集,从这些人的嘴里可以听到不少关于中国的情况。

米列斯库遣使中国并非仅仅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或仅为远东边民纠纷而采取的孤立行动。通古斯人(即鄂伦春人——

① 尤里·阿尔谢尼耶夫发表:《俄国使节斯帕法里(即斯帕塔鲁·米列斯库——译者注)1675年西伯利亚纪行,从托博尔斯克到涅尔琴斯克和中国国界》,1882年,彼得堡;接着又发表《俄国使节斯帕法里1676年从涅尔琴斯克至北京纪行》,1896年,奥伦堡。

② 即公元1677年。

③ 这是指贵族普里克隆斯基,他在新的权贵手下当上了涅尔琴斯克总督。米列斯库头一次到达该城时,凭着马特维耶夫的进荐,普里克隆斯基接待十分殷切。但随着纳雷什金家族的倒台,当米列斯库返回时,在这里却受尽了侮辱,遭到严厉盘查,没收了私人财物,登记了所有文件(参看《旅华日志》第34页,并对照第319页)。

④ 参看A.A.诺沃塞爾斯科和I.V.乌斯季乌哥夫:《苏联历史研究》,第十七世纪,1953年,莫斯科,第548页。

译者注)首领根特木尔偕全家出逃涅尔琴斯克,中国人感到这有损于他们在蒙古纳贡人中间的威望,执意要求引渡;中国大清时代军事实力的增长,对蒙古北部俄国纳贡者执行侵略政策,这些都不可能是决定派遣以米列斯库为首的重要使团的原因。然而,所有这些皆可用来当作外交上冠冕堂皇的借口。实际上,采取这项行动是由封建俄国国内历史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十七世纪初叶,俄国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其影响波及整个世纪。1675年米列斯库出使中国是在他以前的一系列规模较小的类似行动的自然延伸,其目的首先在于保证顺利开展与别国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受到波罗的海和黑海政治经济集团的阻碍。同年,还曾派遣以科西摩夫为首的使团去晋谒蒙古大公奥伦扎布(Aurengzebu),以求建立与波斯和印度的贸易关系。<sup>①</sup>

这些出使活动旨在与亚洲各国建立正常的法制、经济和政治关系<sup>②</sup>,因为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只剩下阿尔汗格尔斯克

① A. A. 诺沃塞尔斯克,上举书目,第543页

② 出使波斯的有:(1600年)霍赫洛夫、扎塞金、萨罗波夫;(1613年)吉洪诺夫和布哈洛夫;(1614年)布列霍夫和阿法纳西耶夫;(1615)萨赫马托夫;(1618年)巴里亚京斯基;(1623年)科托夫;(1646年)科兹洛夫斯基;(1653年)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出使高加索的有:(1604年)塔吉谢夫;(1614年)布列霍夫;(1615年)萨赫马托夫;(1618年)巴里亚京斯基和奇切林;(1623年)科托夫;(1637年)伏尔科夫斯基(1639年)埃列英;(1641年)莫谢茨基;(1650年)多尔恰诺夫。出使远东西伯利亚、喀尔木克人和蒙古人等:(1614年)库洛奇金;(1627)佩菲利耶夫;(1636年)雷布洛夫;(1639年)布扎和伊凡诺夫;(1642年)艾拉斯托夫兄弟;(1641年和1647年)斯塔杜辛;(1645年)贝里安;(1649年)莫斯科维京;(1648年)阿历克塞耶夫;(1643年)波雅尔科夫;(1647年)哈巴洛夫;(1652年)涅吉里亚。出使中国的有:(1618年)佩特林;(1654年)巴伊科夫。(根据D. M. 列别捷夫:《十七世纪俄国地理》1949年,莫斯科)

港这一条渠道了。在这里进行的交易占整个俄国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虽来往于此的船只逐年增加<sup>①</sup>，但商品销售仍然有限。随着商业活动的开拓，国家的年收入不断增加。然而，俄国政治经济日益迅速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需求，耗资甚巨，尤其迫于这样的形势：波斯商人和土耳其商人在中亚细亚和高加索的竞争愈演愈烈，因此俄国不得不尽力开拓对外经济联系。

从米列斯库临行前接受的训谕来看<sup>②</sup>，根据俄国当时政治经济上的需要，他出使的任务有三：

一、全面考察乌拉尔以东西伯利亚的俄国疆土，关于这些地区，流传着许多怪诞臆测之说；

二、尽力与远东建立商业和外交联系，避免波罗的海和黑海封锁的影响；

三、了解中国经济、政治、行政、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实情。

《旅华日志》中关于西伯利亚旅程的记述，适应了第一项任务的要求，详细介绍了西伯利亚的地理、经济和人文资料；而《官方文件》，也就是米列斯库出使活动的正式报告，适应了第二项任务的要求。

《中国漫记》正是第三项任务的成果，也是这位使节的特殊使命，即尽量完整、准确而多方面地了解中华帝国和中国人民，因欧洲流传着各种关于中国的神奇传说，而又所知甚微。

---

① 从1618年的20—30艘，增加到1670年的80—100艘。参看诺沃塞尔斯科所著上引书目，第129页及以下。

② 参看《旅华日志》第4—5页。

从米列斯库的《旅华日志》可见，十七世纪的中国，外人很难进入其内，且一旦跨入，即被处处监视，步步限制。诚然，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中记述了许多这个遥远国度的一些饶有兴味的故事，但往往偏重于教会事务，且不乏泛泛之词<sup>①</sup>，以免引起中国当局的怀疑，从而为其传教活动设置障碍<sup>②</sup>。因此，那个时代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米列斯库完成使命而结出的硕果，意义尤为重要。

根据《旅华日志》，从这位莫尔多瓦人在中国的处境来看，似乎他的外交使命是不成功的，仅仅因为一个礼节形式问题而未能与中国人达成协议。可是，在阅读《中国漫记》之后可以懂得，在米列斯库进入中国国界，尤其抵达北京之后，拖延谈判，耽搁各项官方使命的时日，均属故意，以图延长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这就是中国侍郎官马喇之所以怒不可遏地严斥俄国使节，“我想沙皇是精心挑选你来同我们这些不善辞令、只会直言不讳的人<sup>③</sup>进行谈判的”的真正原因，这也是催促俄国沙皇使节及其随从尽快离开北京并拒绝以任何藉口延期启程的真正原因。但这时，米列斯库已巧妙地延长在北京的停留时间达三个半月之久，以完成训谕中交付的使命。一再拖延耽搁引起朝廷官宦的疑心，因此，1676年8月29日，当米列

① 如金尼阁(《中华帝国介绍》，里昂，1635年)，鲁德昭(《中国通史》，里昂，1667年)，柯且尔(Ath.Kircher)(《中国名胜……图片》，阿姆斯特罗丹米，1667年)，卫匡国(《鞑靼战纪》，安特卫普，1654年)。

② 一次南怀仁“要使节在神像面前起誓，不将所闻之事告诉任何人，也不要笔录下来，直到离开中国国界为止。因为他们(耶稣会士)作为异国人，为了基督倍受艰辛，甚至遭到怀疑……”(《旅华日志》，第169页)。

③ 《旅华日志》，第181页。侍郎为当时中国处理洋务的官员。

斯库进宫接受临别赠礼见到南怀仁时，这位耶稣会士悄声对他说，不能再同他说话了，“因为有人已向尚书和侍郎告密，说我把所有国家机密都出卖给使节了”<sup>①</sup>。

米列斯库9月1日的记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看来我如果再不准备上路，他们就可能使用强力将我赶走。因此，我要侍郎立即给我派遣车辆，我将尽力而为，无论有多大困难，也一定要走。”<sup>②</sup>

《中国漫记》是米列斯库忠实而出色地完成使命的一项积极成果，“为了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全面昌盛和荣耀”。<sup>③</sup>

米列斯库此书是俄国文学中全面介绍当时对人们如此陌生的中国的第一部著作<sup>④</sup>，与那个时代世界文学中同类主题的著作相比，它更显完善<sup>⑤</sup>。书中还包含了丰富的人种学材料，其论述反映了这位莫尔多瓦人的深刻思想及进步的历史学观点。这些观点，作者在《中国漫记》成书后不久所撰写的《俄罗斯皇帝史传序言》中作了表述。

就作者所处的时代而言，《中国漫记》可称为专题著作的典范。书中历史、地理、行政统计资料与物质文化情况交汇融合，再与经济状况密切联系，并顺其自然地谈到了社会机构，思想意识、民间艺术、传统习俗、神话传说、中国人的性格与职业等等。

本书共有五十八章，分为均衡的两大部分，虽篇幅并不

① 《旅华日志》，第291页。

② 参看《旅华日志》第304页。

③ 《中国漫记》的结束语。（参看《旅华日志》第XXVII页）

④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49卷，第253页。

⑤ 参看巴德利上引书目，第211页，说米列斯库提供了一些极其重要的资料。

相等。

头一部分包括二十章，正如米列斯库在第二十章结尾说的，这部分叙述了“中国人的公众事务、帝国情况和风俗习惯，以及一般介绍所涉及的其他情况”，其次序如下：历史（第一、二、三章）、地理和经济（第四、五、七、十六章）、外交和政治（第六、九、十、十八章）、军事（第二十章）、人种学（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和十九章）。

第二部分“对所有十五个省分别作了专门描述，介绍了这些省的省会和较小的城市、河流山川、自然资源、物产种类”。这部分包括三十八章，其中最后两章介绍了朝鲜和日本。这些简短的描述，大体上沿袭了本书头一部分的结构和格局，因此可以说对每个省都作了一篇专题论著，这些论著把头二十章里论述的主题地方化了。

本书写作风格十分严谨，表现了米列斯库对中国人民的赞赏和仰慕。米列斯库的仰慕之情既来源于在嫩江边和在北京作长时间停留期间的个人观察和阅读介绍当时中国的著作之所得，也来源于直接交谈。他客观地观察了中国人民勤劳、富有才智、谦虚、诚实、特别是崇尚文化的品质，并在作品中作了充分的反映。当时西伯利亚东部边界的哥萨克战士经常同膘悍骁勇的独立蒙古游牧部落交往。米列斯库有时受这些人讲述的故事和他们的看法的影响，嘲讽中国大汗的士兵涣散而无斗志，说他们“勇如妇孺，怯如走兔”。但是他的赞赏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在嘲讽时仍然认为，这些现象起源于他们爱好和平的本性，“他们不尚武事，他们擅农、经商和其他职业”。因此，他们虽然武器精良，“弓马娴熟”、并有“自古发明的铁制

火砲”，但不懂军事艺术，因为他们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不好武事，也不提倡武事，习武被视为不光彩的事”，“舞枪弄棒和从事战争均被视为盗贼行径，而非正人君子之所为；凡正人君子均应和睦相处，谦恭相待，械斗和战争类乎禽兽”。

当然，由于接触面窄，仅限于能出入使团在北京驻地庭院的那些人，米列斯库的观察和判断难免有谬误之处。有时他的结论来源于一些宫廷达官贵人、他们的奴仆和他们推荐的商贾，而这些商人要尽手腕，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巧取豪夺。因此，米列斯库使用了“奸诈、虚伪、诡譎、狡黠、不仁不义”等形容词。联系到《旅华日志》中记述的在北京进行外交谈判的情况，这就更不难理解了。但是，一旦笔触言及整个中国人民，赞叹之词便油然而生：（中国人）“惯于无休止地艰苦劳动……体形轻巧、习于徒步行走、衣着厚实；夏日赤膊，在炎日下也不戴帽子。在田野、城镇，劳动之艰苦无法形容。他们天赋健康的体质，自幼习于劳动，所以很少见到疾病患者、体质孱弱者和乞丐。”

田野“处处精耕细作，阡陌纵横，田垌交错，中国的耕作技艺举世无双……中国之于世界，犹如指环上镶嵌的宝石”，因为，“即使荒漠沙滩，中国人也能以他们的技艺将其变为良田”。

米列斯库著作的价值在于传给我们广博的关于中国的知识，虽然其中一些早已过时，仅有史料价值，但有些却至今仍然有效。使米列斯库这位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更为感动的是，中国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如此珍重文化知识，以至“无人不知书识字”。至于那些愚昧无知、没有文化的人，即使最低的

职位也得不到，知识愈渊博就愈受敬重。任何官职的晋升以学识深浅为依据。即使普通百姓，也没有到十五岁还不书识字的。因此，他们除了皇亲国戚，都不讲出身门第，他最敬重的就是学识最渊博的人。满腹经纶的人，即使出身卑微，也可得到高官厚禄。

米列斯库的这种奋斗立场十分突出，因此，在写作此书后仅隔几年，也就是彼得大帝初年，他即成为俄国主管治学和刊印教科书的官员。

米列斯库还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资料，反映了他对中国的工艺技术的兴趣。

米列斯库记述了中国人掘井的办法：“用一种制作精巧的铁手，投置地底深处能自动敛土舀水，然后提取出来。”他还对各种中国船舶作了精彩的描写，他讲述了如何周密筹划开凿全国的河道，描写了一条可通航的河道，“河上用硬质石料构筑了二十座水闸，水闸有闸门可供船只通行。闸门由厚实的桁架支撑着，每当船只通过，闸门开启，船只顺着水流行至下一道闸门，依次通过所有的闸门”。他谈到如何制造瓷器，描写了一种奇特的交通工具独轮车，说明城市的引水沟渠，如何通过竹管从山上引水直至房屋庭院。他还讲述了中国的建筑艺术，描写名胜古迹，以及桥梁建筑的细节。另一些资料说明了中国的动植物和矿藏等自然资源，并指出其经济价值。米列斯库还记载了当时视为闻所未闻的奇事：火井——天然气、燃烧如柴之黑石头——煤炭。他还论述了中国的医学、饮食、狩猎，并作了描写，还介绍了军事技术、武器、战略性建筑、民用建筑、奇特的地形、迷人的景色。夹叙夹议，有故事也有评



论。作者清新的笔调、使得统计数字也变得饶有趣味，穿插着许多神话传说，使文章更加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百读不厌。有些故事细腻入微而又朴素动人：“在新都城（音译 Hingtū）生长一种美丽而奇特的小鸟，这种鸟不象一般鸟那样孵化繁衍，而是生于一种名叫桐华（音译 Tunhoa）的美妙花朵，鸟名就叫桐华凤（音译），啄红如丹铅，羽毛五彩缤纷、色泽鲜艳。鸟与花同寿，花谢鸟亡。鸟儿展翅飞翔，就象花在空中飞舞。鸟美如花，寿短亦如花。”另一个故事讲一个异国人来到中国，购一鸚鵡，意欲带回本国，当鸚鵡发现后即对此人说：我是中国鸟，岂能出走异国他乡！言毕即歿。作者随即无限感慨地说：“此事寓意非同寻常，它说明不但中国人热爱祖国和故土，甚至鸟也不愿离乡背井投奔异国。”

《中国漫记》包括大量的极其重要的地理资料，米列斯库本人也意识到，这些资料对中国长城以北至西伯利亚边界一带地域的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外，人种学资料和民间艺术资料也十分丰富。

所以，米列斯库的著作是关于中国古老文明的一幅才华卓绝的壁画。它来源于作者对于时代的积极的、科学的、进步的观点，也来源于他对于美的艺术敏感，两者交相融合，浑然一体。

米列斯库的《中国漫记》原始手稿已失传。但在时间的长河里，史学家先后发现了十二种教会斯拉夫文<sup>①</sup>手稿和三种

---

<sup>①</sup> 布加勒斯特《研究》杂志1957年第七期上，格·康斯坦丁在一篇注文中指出，苏联研究员梯默尔找到了《中国漫记》的二十六种手稿，并准备出版一部经过考证的版本。

希腊文<sup>①</sup>手稿。希腊文手稿是1695年由耶路撒冷大主教多索夫特伊派驻莫斯科的使臣赫里桑·诺塔拉负责翻译的。显然，各种手抄本之间是有出入的，因为抄写者各有不同的摹本，有的是原本，有的是手抄本。因此，有些讹谬延传下来，有的则被更正了；有些段落脱漏了，或加进了一些词；另外一些则因抄写者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忠诚态度各异，而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都是一般手抄本的通病。但是，专家们的考证表明，无论手抄本同莫尔多瓦学者的原始手稿差异多大，其内容并无实质变化。

在教会斯拉夫文手稿中，只有三部是用古代教会斯拉夫文写成的<sup>②</sup>，即：

估计为1677年写成的<sup>③</sup>手抄本，藏于列宁格勒国家图书馆，编号T·F·141号。

1695年抄写的<sup>④</sup>手抄本，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斯拉夫文书库，编号35号。

喀山大学斯拉夫语教授F·T·瓦西里耶夫私人藏书86号手抄本。1910年印于喀山<sup>⑤</sup>的印刷本即以此抄本为准，本书也以此为准。

此抄本没有注明抄写者姓名，也没有抄写日期，但据喀山大学斯拉夫文教授A.I.亚历山德罗夫作的书法分析，此抄本书于十八世纪末。抄本共210页，其中三页为序言，207页为本

① 根据C.C.久列斯库：《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1927年）。

② 其他手抄本，无论是十七世纪末叶的还是十八世纪的，都是用书写体写成。

③ 《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手抄本目录》确定的抄写日期。

④ 此抄本原属G·斯巴尔文菲尔德(Sparw enfeldt)，注明了抄写地点和日期。

⑤ 见本书附注。

文。全书共分五十八章，但其中两章均标为第三十七章，所以实际上此抄本有五十九章。如果把此抄本没有收进去的《阿穆尔河概貌》也算作此书的一部分，那么《中国漫记》总共有六十章。

至于斯帕塔鲁·米列斯库完成《中国漫记》一书的日期，专家们一致认为为1786年11月13日<sup>①</sup>，即作者本人在书后注明的日期。

在第一章中，米列斯库在描写中华帝国之悠久历史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的古书记载，他们的帝国建于盘古开天的2642年，至今已4545年，亦即基督救世主诞生以前2867年。”<sup>②</sup>

可以推算出这几行字是斯帕塔鲁·米列斯库在1678年9月1日以后写的。这个日期同手抄本末尾注明的日期不符，因而引起了许多猜测：

(1)、手抄本末尾注明的日期是讹误。从一年过渡到另一年时往往容易产生这种讹误。

(2)、斯帕塔鲁考虑到自己从中国返回后的处境，把书的

---

① 是1677年，而不是亚历山德罗夫在前引书中说的1678年。因是十一月，从1786年中应减去“创世”5509年。

② 前引书目第三页。此段我们只能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图书馆154号藏书希腊文的手抄本的相应段落对比，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抄本是吻合的。卢梭收藏的希腊文手稿失传。据说他交给了伯尔切斯库，但在布加勒斯特的伯尔切斯库私人藏书中也找不到。这两份相距遥远、来源不同的手稿中，记载的年份是相同的，这就证明了斯帕塔鲁曾有意识地计算过年份。

$2642 + 4545 = 7187$ 年，这是撰写第一章的时间。

$2642 + 2867 =$ 公元前5509年，也就是说这一章是9月1日以后写的。

$7187 - 5509 = 1678$ 年，而手抄本后注明的日期却是1677年(7186)。

写作时间前移了，以和回程的日期相应。

(3)、斯帕塔鲁的《中国漫记》写了两稿，第一稿成书于1718年11月13日<sup>①</sup>；第二稿于1718年9月1日以后开始撰写，这就是作者返回莫斯科<sup>②</sup>近一年以后上呈使节事务部的那最后一稿，但在末尾注明的却仍是第一稿的日期。

看来，最后这个推断是正确的，因为斯帕塔鲁从中国返回后，直到1679年9月才回到使节事务部重新任译员，但薪俸减半。

约·弗·巴德利在他的《俄国·蒙古·中国》<sup>③</sup>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漫记》的归属问题。巴德利在他的书中把《中国漫记》(喀山文本)<sup>④</sup>和在中国长期生活过的耶稣会士卫匡国所著《中国新舆图》作对照，断言斯帕塔鲁“总的来说，逐字逐句地翻译耶稣会士卫匡国<sup>⑤</sup>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首次用拉丁文出版的名著《中国新舆图》的文字说明”。这位英国学者说，米列斯库在中国期间，一直犹如囚犯被困于北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斯帕塔鲁除了卫匡国的著作以外，不可能蒐集到如此浩瀚而珍贵的资料，只是没有明说而已。巴德利言下之意是，米列斯库力图隐瞒《中国漫记》的资料来源。作为论据，

① 这时作者尚在托博尔斯克。

② 1678 (1718) 年1月5日。

③ 1919年伦敦版，第二册，205—214页。(汉译本已于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

④ 关于这个抄本，巴德利在上引书目第二册209页中说，它可与红衣主教希梅内斯及其孔普留顿版的《圣经》多种文字对照译本中的希腊文本媲美。

⑤ 生于1614年，1643年作为耶稣会传教士到达中国。根据他本人在《鞑靼战纪》中说，他曾是《中国图说》的作者阿·柯切尔的学生，1651年为出版《中国新舆图》去阿姆斯特丹。1661年死于杭州(Hang-ho)。

巴德利吞吞吐吐地说，他彻底剖析了喀山文本，並把它同《中国新輿图》作了对照<sup>①</sup>，他已把取自卫匡国的段落和属于莫尔多瓦学者本人的段落作了笔录。经过对照，他断言在整本《中国漫记》中，斯帕塔鲁所作仅限于：第三章的开头部分，第四章，第五章，第十章中关于中国官衔职称的描写，第二十章中关于中国和蒙古的军队及武器的描述。接着这位英国学者列举了莫尔多瓦人米列斯库从卫匡国著作中删节的地方，并说：“这十分严重，很明显，这是企图隐瞒他的作品的真实来源是耶稣会士的著作”<sup>②</sup>。可是，因为没有找到尼古拉·斯帕塔鲁著作的原始手稿，而只找到了几个抄本，所以即使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本人也不能肯定，这些删节之处是属于斯帕塔鲁，还是属于抄写者。然而，由于巴德利在学术界享有的权威地位，他的意见成了定论，即：《中国漫记》不是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的原著，而只是卫匡国著作的译本。1927年以前的罗马尼亚学者<sup>③</sup>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巴德利的观点。1927年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sup>④</sup>，经过严格的考证<sup>⑤</sup>，短时间就得出了结论：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是“《中国漫记》的原作者，因为

① 前引书目第二册第210页。

② 同上。可是，巴德利却一字不提波蒂埃(G. Pauthier)在他的著作《中国或历史的描述》(1837年1月巴黎版，第441页)中提供的一个资料；费雷勒(M. Freret)认为，《中国新輿图》是明朝一本中国地理书的节译。

③ 巴纳依特斯库(P. P. Panaitescu)；《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1636-1708)》，(刊于《法国的罗马尼亚问题研究文集》，1925年1月巴黎版，第115页)；约尔加(N. Iorga)；《罗马尼亚文学史》，1925年1月布加勒斯特版，第368页。

④ 久雷斯库(C. C. Giurescu)：前列书目。

⑤ 这场争论是久雷斯库以其前引书目发起的，然后，巴纳依特斯库在他的著作《达契亚——罗马尼亚》第五卷(1927—1928)第674—677页中作了响应。

这本著作不是象巴德利所说的那样，是卫匡国著作的文学翻译，而是对卫匡国著作进行了整理，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章节，作了许多补充和删节。既然是重新整理，当然也使用了别的书籍和传说。”<sup>①</sup>

的确，巴德利回避了斯帕塔鲁撰写《中国漫记》的缘由。上面提到的那次学术考证，强调提出了这个缘由，这也是上述结论的论据：斯帕塔鲁离开莫斯科时接到的训谕中，有一条就是要求他根据自己的深入调查，写一份对整个中华帝国的介绍，“务必全力以赴，亲自向所有了解情况的人作调查，力求全面真实。”……<sup>②</sup>因此，斯帕塔鲁为了“满足俄国政府的愿望”，“不得不搜寻一切有助于了解中国情况的资料来源，为此，他也使用了耶稣会士卫匡国的《中国新舆图》文字说明。米列斯库把他在旅途中和在北京停留期间蒐集到的资料增补进去，汇集起来写成了《中国漫记》。这是一份出使报告，是按俄国政府的要求撰写的官方文件，而不是出于本人意愿写的。”<sup>③</sup>……当多索夫特伊大主教致函斯帕塔鲁索取其著作的抄本时，斯帕塔鲁本人在信中说：“此件必须保密。”<sup>④</sup>

此外，巴德利不愿意看到，在第五章里，“米列斯库本人也承认，他参看了一份耶稣会士撰写的从印度到中国的道路情况的材料……”<sup>⑤</sup>在彼特洛夫斯基手稿的题解中也说，著作的

① 久雷斯库前引书目，第10页。

② 《旅华日志》，国家文艺出版社(E.S.P.L.A)，1958年版，第4页。

③ 久雷斯库，上引书目，第5页。

④ 同上，第6页。

⑤ 同上，第7页。

“一部分来自其他书籍和传说”<sup>①</sup>但巴德利认为这也不足令人信服。此外，这位英国中学家没死过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书第35号手稿<sup>②</sup>，在这份手稿的题解中就说，《中国漫记》的资料来源，“一部分来自作者本人的见闻……一部分来自其他书籍和传说”。<sup>③</sup>

下面，我们站在与上述观点不同的立场上，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根据《中国漫记》的记述，尼古拉·斯帕塔鲁本人在《旅华日志》中的言论，以及其他有关这位使节出使中国前后情节的各种记载，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论据，来说明《中国漫记》的资料来源。我们这些论据，改变了前面列举的关于《中国漫记》的归属的观点。

在《中国漫记》书里，斯帕塔鲁就多次指明，他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从何处获得的。当然，按照十七世纪东欧文化的传统习惯，斯帕塔鲁并没有象今天那样严格地、科学地指明出处。

譬如，在导言的末尾，斯帕塔鲁写道：“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我们将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史书，简述一下中国的历代皇帝。”在第二章里又说：“我们是最好的见证人。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在另一处我们可以看出，斯帕塔鲁既参阅过中国人绘制的地图，也参阅过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他说：“中国人把他们帝国的地图绘制成方形，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较清楚，略呈园形，似月亮。”<sup>④</sup>书中还有这样的段落：

① 巴德利，上引书目，第211页；久雷斯库上引书目，第7页。

② 久雷斯库，上引书目，第7页。

③ 久雷斯库，上引书目，第9页。

④ 参阅《旅华日志》，上引出版社，第183页。巴德利在上引书目第345页说，“耶稣会士一面装作看地图，一面给使者说……”

“谁想了解他们的偶像的真形，可以参看耶稣会士撰写的介绍中国的书籍，以及荷兰人出使中国撰写的书籍，在这些书里都作了清晰而真实的描述。”<sup>①</sup>讲到蒙古人，斯帕塔鲁写道：“我现在亲身体察到了这一点，以前在阿穆尔河上曾同他们作过战的哥萨克人给我作了讲解。”从二十一章到五十五章，书中列举了许多统计材料，斯帕塔鲁经常讲到中国人口调查书籍《户口册》。<sup>②</sup>在描写中国长城时，斯帕塔鲁说：“他们说，在这些城墙上，可以并排奔驰十二匹马。”此外，斯帕塔鲁还听到不少神话故事，关于野人的传说和其他奇闻。有时，斯帕塔鲁还引用“在场的耶稣会士的话”作为例证，引用“威尼斯的马可·波罗的书”，或是“侍郎给我们讲的”其他的事……

所以说，在《中国漫记》里，在《旅华日志》里，斯帕塔鲁本人就告诉了我们他的资料来源：有书面的，有口头的，有个人直接的观察。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以下几项：

1. “使节事务部”档案馆<sup>③</sup>里收藏的斯帕塔鲁前期的使节们的报告。

2. 尤里·克里让尼奇<sup>④</sup>的两本手稿。米列斯库是在托博

① 其中包括柯且尔的著作《中国图说》，1667年于阿姆斯特丹（巴黎，《偶像》，第129—163页）其中包括许多插图。

② 值得指出的是，米列斯库列举的统计数字，只有一部分是和卫匡国的《中国新舆图》一致，很明显，两人的材料来源不同。其实，纽霍夫（J. Nieuhoff）的著作里经常提到中国人口统计材料。

③ 《旅华日志》，第XXXII页。列别捷夫：《十七世纪俄国地理》，第130页。

④ 巴纳依特斯库，上举书目，第86页。根据比耶罗鲁科夫：《十七世纪莫斯科社会的精神生活》，1902年莫斯科版，第226—232页。



尔斯克遇到他的。在这两本手稿中，描写了中国的城市。

3、金尼阁的书《基督教远征中国》<sup>①</sup>，书中提到德·鄂本笃的旅行，《中国漫记》中也提到他的这次旅行……<sup>②</sup>

4、德·戈耶尔和凯塞于1656年7月至1657年3月所著《荷兰遣使中国记》（1665年由纽霍夫出版）。<sup>③</sup>至今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本书，虽然在整个旅行过程中，米列斯库一直都是把这本书带在身边的。在《旅华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时，“他随身带着荷兰出使中国纪行的书籍，书中明确记载了他们在中国受到接待的情况”。<sup>④</sup>1676年7月16日，一位中国官员拜访斯帕塔鲁时，曾请求“借用荷兰人撰写的关于出使中国并附有版画的书”，<sup>⑤</sup>以上呈皇帝。显而易见，只要对照一下《中国漫记》就可以看出，米列斯库曾取材于这本著作，《中国漫记》中所列举的数字和卫匡国所列举的数字也不同。<sup>⑥</sup>

① 奥格斯堡1615年，和里昂1616年出版；也请参阅巴纳依特斯库上举书目第84页注。

② 久雷斯库，上举书目，第7页。

③ 在米列斯库启程赴华时，马特维耶夫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到这本著作（见《旅华日志》第XXXII和485页）。在巴纳依特斯库的上列书目第84页注二中，提到此著作1665年版的一个荷兰文本和1688年版（也就是在米列斯库出使中国以后）的拉丁文本。巴德利在上引书目第一卷CCLV页中，只提到1665年版的法文本，米列斯库携带的可能就是这个文本，我们也特别研究了那个文本。1669年还出版过一个英文本。

④ 《旅华日志》第211页；巴德利上引书目第二卷第361页。

⑤ 《旅华日志》第248页；巴德利上引书目第二卷第381页。

⑥ 根据需要，我们考证了其中一部分数字，作为注释附在本书各页下面。这些数字所以能说明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卫匡国的数字不符。但不仅如此。因为，这也可能是誊写的讹误，甚至可能是作者本人的讹误。这些数字的重要性还在于，有些是卫匡国著作中根本没有的，而只有在纽霍夫的著作中才能找到。

上述这些论据的重要性在于，它证明斯帕塔鲁的著作并不是“基本上是逐字逐句的翻译”，也不是经过加工改编的《中国新舆图》，同时它否定了斯帕塔鲁有意隐瞒他取材于耶稣会士<sup>①</sup>，这种责难是不公正的。因为，从马可·波罗到门多萨、金尼阁、鲁德昭、卫匡国、纽霍夫、柯且尔，一直到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他们每个人关于中国的论著，虽并不都标明来源，无不包含引用前人著作的素材和段落，并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加以补充和扩展。纽霍夫虽然参阅了马可·波罗、门多萨、鲁德昭和卫匡国的著作，在他写的书中，除了在荷兰使团出使中国期间他个人的阅历以外，显然也采用了这些著作，但只是顺便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从不列举他们的著作名称。关于斯帕塔鲁故意删节卫匡国文章的说法，也可以对照一下《荷兰遣使中国记》、《中国漫记》和《中国新舆图》几段说明，柯且尔也曾引用这几段说明。对照的结果是：可以概括地说，在纽霍夫和斯帕塔鲁的著作中，都有同样的删节（更确切地说是省略），斯帕塔鲁补充了一些个人的评论，以及出自下列书目的资料，即：

5、南怀仁于1676年5月20日寄送给米列斯库的拉丁文书籍，米列斯库从中“了解到南怀仁撰写的介绍中国情况，以及中国人接待外国使节的方式”。<sup>③</sup>这个线索很重要，因为查遍有关中国的书目<sup>④</sup>，找不到一本南怀仁在1676年以前印刷出

① 巴德利上举书目第二卷第210页。

② 《旅华日志》和巴德利的上引书目第二卷第337页。

③ 波蒂埃和巴津：《现代中国》，1853年巴黎版，第657—672页；亨·科迪埃：《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著作书目》，见《东方文集》，1883年巴黎版，第495—546页。

版的这种内容的书籍。很可能这是一部“书籍”形式的手稿，因为这个耶稣会士声言他写了这本书。相反，斯帕塔鲁提到的南怀仁的助手安文思，在1668年撰写了《中国最新记事》。米列斯库在北京期间，他只有这部书的手稿，因为这部书直到1688年才在巴黎印行。<sup>①</sup>

我们从《旅华日志》中还可以看到，尼古拉·斯帕塔鲁虽在北京时被软禁在使馆的院里，但并不十分孤立，因为虽有各种禁令，但中国侍郎、布哈拉商人、通译、在北京的俄国侨民以及耶稣会士经常拜访他，尤其是耶稣会士，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通行无阻、无拘无束”地拜访他<sup>②</sup>，并同他长谈各种见闻或观感<sup>③</sup>。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斯帕塔鲁的资料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他本人并没有隐瞒，而且还翻译和多次提到卫匡国的另一部著作《鞑靼战纪》。可是，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斯帕塔鲁一字不提，甚至连间接隐晦一些地都不曾提到《中国新舆图》？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位莫尔多瓦学者并没有看到印刷出来的这部著作的全部内容，只是通过克里让尼奇和南怀仁寄来的手稿看到了这部著作的一些片断（这些手稿并没有指明出处，十七世纪时即使在欧洲也经常是这样做的，因为一般印刷版本数量较小，许多著作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的），尤其是通过纽霍夫的著作才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新

---

① 此书由贝努翻译成法文。安文思死于1677年，此时米列斯库已离开北京。译者在第35页的19注释中说，纽霍夫全部照抄了卫匡国介绍中国的资料。

② 《旅华日志》第198页。

③ 《旅华日志》第219页；也参阅巴德利上引书目第二卷第366页。

輿图》，而纽霍夫的著作里并没有引用这部书的名字。

从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的《中国漫记》中，我们可以区别哪些是取材于书面资料的，也就是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行政管理以及一些统计和历史性资料，这些资料大多是数据性的和比较枯燥的；同时还可区别哪些是口头搜集的资料和个人观察所见。这两类资料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米列斯库做了精心地筛选，进行了细致的文字加工，构成了一部完整著作，它既不是翻译之作，也不是改编的作品，而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介绍个人见闻的著作。

十七世纪末叶，俄语在文学的道路上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尼古拉·斯帕塔鲁掌握的俄语词汇有限<sup>①</sup>，但精通当时在罗马尼亚各公国官府使用的教会斯拉夫语，他使用的语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写这部著作时，是用罗马尼亚语思考的。但是，他居然创作了这样一部生动形象的文学著作，以至在近三百年之后的今天，读起来仍如此脍炙人口，不忍辍读。

翻译出版，并向我国广大读者推荐斯帕塔鲁的这部著作，这是对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聊表崇敬而做的微薄的努力，这位出生于莫尔多瓦土地上的学者，和十七世纪如此众多的学者并驾齐驱，为人类文化史又增添了新的篇章。

科尔内柳·伯尔布勒斯库

---

<sup>①</sup> 斯帕塔鲁在写作《中国漫记》一书时，还不懂俄语，因为他在1675年7月从叶尼塞斯克给马特维耶夫致函：“恕我冒昧，我竟亲自动笔用俄语写信了，但我愿意学俄语，并用俄语书写。”（《旅华日志》第36页。）

## 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 身世年表

1636年 米列斯库生于伐斯卢伊<sup>①</sup>。父亲加弗里尔·兹勒德雷什蒂(Gavrîl din Zlătăresti)于1630年在米列什蒂村附近购置了一些土地。据考证,加弗里尔家族原籍伯罗奔尼撒半岛,是当地阿罗马尼亚族人,后移居莫尔多瓦,加弗里尔就出生于此,同当地一位小贵族家庭出身的女子成婚。

1642—1644年 进雅西三圣御学堂(莫尔多瓦君主伐西雷·卢普创办)学习。尼古拉的老师加布里埃·弗拉西奥斯——也是阿罗马尼亚族人——劝说他父亲把儿子交给他,带他去君士坦丁堡希腊正教大主教主办的高等学府去就学。

1645—1653年 在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就学。在这里,尼古拉认识了伐西雷·卢普之子什特番尼策、耶路撒冷未来的大主教多索夫特伊以及莫尔多瓦未来的君主格奥尔吉·吉卡,这些人都是阿罗马尼亚族人,在尼古拉的一生中,他们还要多次相遇。

1653年 回到莫尔多瓦。莫尔多瓦君主格奥尔基·斯特凡任命尼古拉为宫廷执事。

1655年 尼古拉在尼阿姆茨教堂找到了一些古代资料,还搜集到了一张圣玛丽娅的神象,根据这些资料,尼古拉断

---

<sup>①</sup> 伐斯卢伊(Vaslui)位于罗马尼亚东部,今为一个县。——译者

言,在善良的亚历山德鲁统治的年代,拜占廷皇帝的太子扬·巴列奥洛古尔曾到过莫尔多瓦,并曾坦露赞美之情:“我从未见过或闻过如此富饶、充满硕果的大地、优美的习俗、盛传爱戴祖国之情的地方。”善良的亚历山德鲁对此回答说,他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独立自主的君主,为了保卫这个国家,他敢于拿起武器同任何敌人作战。

1658年 格奥尔基·斯特凡被废黜后,格奥尔吉·吉卡继任莫尔多瓦君主,尼古拉成为吉卡的宠臣之一。

1659—1660年 格奥尔吉·吉卡转任蒙特尼亚<sup>①</sup>君主,尼古拉随同前往。为此,君主赐尼古拉“御前侍卫”贵族爵位。

1660年 格奥尔吉·吉卡被废黜后,九月,尼古拉回到莫尔多瓦。这时莫尔多瓦的君主为伐西雷·卢普之子什特番尼策。旧时的同窗欣然欢迎尼古拉作为自己的宫廷臣子,并赐以崇高的荣誉和丰厚的俸录。从希腊文翻译成罗文:《诸多益世问答<sup>②</sup>》。

1661年 什特番尼策不幸早逝,尼古拉又赴蒙特尼亚,这时格奥尔吉·吉卡之子、尼古拉早年的同窗格里戈雷·吉卡继任君主。格里戈雷·吉卡任命尼古拉为驻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使节。在君士坦丁堡期间,尼古拉把《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罗文,还考证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家族史料。同时,他还结交了和加深了同一些人的友情,其中包括塞尔班·康塔库齐诺——未来的蒙特尼亚君主。

---

① 罗马尼亚古代三公国之一。——译者

② 斯帕塔鲁在这里说:“我们蹩脚的罗马尼亚语中”,“宙斯”(Deus)这个词“来自拉丁文,其实一半罗语词汇都是来自拉丁文”。

1664年 土耳其在列文茨战败奥地利，格里戈雷·吉卡获背叛奥斯曼帝国罪名，被废黜蒙特尼亚王位，逃亡波兰宫廷。尼古拉作为被废黜的君主的宠臣陷入阴谋蛛网，被迫逃离君士坦丁堡，亡命他国。在逃离之前，他把《圣经》译文手稿交给了塞尔班·康塔库齐诺，这部手稿即为布加勒斯特所存圣经——1688年印行的塞尔班版《圣经》罗文译文的基础。他出亡的目的地是柏林，投奔弗里德里希·威廉朝廷。

1666年 尼古拉抵达波梅拉尼亚的斯德丁（波兰西北部一城市——译者），前君主格奥尔基·斯特凡也逃亡在此，他派遣尼古拉这位前宫廷执事到瑞典他的保护人——瑞典国王那儿去送信，另一封送给法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阿尔努尔德·德蓬绷。莫尔多瓦学者在斯德哥尔摩逗留了数月，同法国外交官结为朋友。这位法国大使真诚钦佩他在古代语言和世界文化方面的渊博知识。在德蓬绷的鼓励下，莫尔多瓦学者撰写了《醒世警言》(Enchiridion)，署的是他的全名：尼古拉·斯帕塔鲁<sup>①</sup>。这部著作在巴黎出版，比迪米特里埃·冈特米尔的《奥斯曼帝国史》的法文版早问世七十五年。他还把一部祈祷文翻译成罗文，是供格奥尔基·斯特凡祈祷用的《晚祷词》，文后注明：“此为尼古拉·斯帕塔鲁之译文”。

1667年 奉格奥尔基·斯特凡之旨，抵法国向路德维克十四世递交书信，请其在奥斯曼帝国朝廷上为其说情，以重新

<sup>①</sup> 尼古拉·斯帕塔鲁的传记混淆了他的姓和他的职称（他的官职是御前侍卫，罗文为Spătaru——斯帕塔鲁），这种混淆起因于内古尔且，他称尼古拉的姓为米列斯库，而尼古拉本人及其同代人米隆·科斯丁都没有用过这个姓。此外，尼古拉有个哥哥名波斯多拉凯·斯帕塔鲁，也在莫尔多瓦官拜御前侍卫，这就更加深了这种误解，以为斯帕塔鲁就是他的姓了。

获取莫尔多瓦的君主权。法国国王在回信中说，他“接见了男爵斯帕塔鲁。”其实，阿尔努尔德·德蓬绷在为斯帕塔鲁写的一封信致御前教堂(Port Royal)冉森教派教徒的介绍信中，也称“斯帕塔鲁男爵”。斯帕塔鲁的《醒世警言》一书就是这些冉森教派教徒们帮他印刷出版的。

1668年 1月28日，格奥尔基·斯特凡重病不愈，卒于斯德丁。尼古拉·斯帕塔鲁回到莫尔多瓦，此时君主为伊里亚什·亚历山德鲁。十月，伊里亚什被废黜，被迫出走君士坦丁堡。但在出走之前，给尼古拉·斯帕塔鲁处以剜刑，因为这位君主认为尼古拉·斯帕塔鲁图谋不轨，企图篡夺王位。这种刑罚是专门制裁企图篡夺王位的人的，在1663年，格里戈里·吉卡也曾对塞尔班·康塔库齐诺施以此刑。其实在君士坦丁堡逗留的三年期间，尼古拉·斯帕塔鲁找到了其父在拉科尼亚族(即后来改称为阿罗马尼亚族——译者)的家谱，证实他出身于布亚·斯帕特家族亲王——这个家族在1304年首次在文件中出现——故自称“莫尔多瓦的拉科尼亚族贵族”(男爵)，同时，也自称前瓦拉几亚(罗马尼亚南部地区的古称——译者)将军。在《醒世警言》一书上，也是这样署名的。

1671年 尼古拉·斯帕塔鲁重抵君士坦丁堡。当时，格里戈里·吉卡取得了土耳其人的原谅，当然他的外交使节也同样获得原谅。尼古拉·斯帕塔鲁的故友、长期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耶路撒冷大主教多希特伊(即多索夫特伊——译者)，应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之托，为尼古拉·斯帕塔鲁写了一封推荐信，荐举他去莫斯科任职，为沙皇效劳，同时要求斯帕塔鲁继续充任这位大主教的亲信，为他办理一些



宗教事务，建立希腊正教和俄罗斯正教之间的联系。一月末，尼古拉·斯帕塔鲁启程去莫斯科。二月五日，从亚德里亚诺波尔出发去贝尔格莱德。四月，途经匈牙利，会晤了费伦克·拉科西，后抵达波兰宫廷。

5月23日入俄国国境，经斯摩棱斯克赴俄国首都。12月14日，尼古拉·斯帕塔鲁到沙皇朝廷任职，在使节事务部——主管外交事务的衙门任希腊语、拉丁语、罗马尼亚语翻译。

1672年 用教会斯拉夫语编写了《数论》，是一本事例汇编，按时序排列，用于教学。

1673年 1月25日用教会斯拉夫语写成《四大皇朝》，这是一本献给沙皇的书。同年，收到莫尔多瓦君主斯特凡·彼特里且依库来函，请他在沙皇面前美言。

他还撰写了《列王纪》、《君士斯丁堡圣索菲娅教堂介绍》、《缪斯(或七门自由科学)》(Cartea hieroglifelor)、《世界七大奇迹》、《斯拉夫——希腊——拉丁文词典》、同彼得·多尔戈夫合著《米哈依·费奥多罗维奇沙皇登基记》、《沙皇纪年表》。

1675年 3月3日，尼古拉·斯帕塔鲁率使团自莫斯科启程，赴中华大汗帝国。3月30日，使团抵西伯利亚边界托博尔斯克。5月3日，一切就绪，使团沿额尔齐斯河出发去北京。12月30日，越过整个西伯利亚，抵达额尔古纳河岸。

1676年 4月17日，结束在嫩江畔卜魁村的停留，使团车队沿陆路朝北京进发。5月20日，使团抵达北京城，居住在一座象监狱般的有封闭围墙的大宅院。

9月1日，使团自北京出发回返莫斯科。10月8日，使团